字典的價值

往事鈎沉

李北陵

無意間在網上讀到這條消息：自二〇一一年一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召開出版會議，倡議開展向中西部貧困地區農村中小學生捐贈《新華字典》活動後，一年多來，各界累計捐贈的《新華字典》已超過五百萬冊。

這條新聞配發了記者拍攝的圖片：在寧夏固原市原州區張易鎮上馬泉村，拿到新字典的孩子們迫不及待地席地而坐，翻讀起來。

讀罷這條新聞，眼眶不由濕潤了。曾經經歷過中國人普遍沒有字典可讀的貧窮年代，以及雖然有字典也不敢公開翻閱的「文革」時代，我太知道字典的價值。

成長於重慶北碚的我，初中就讀的學校就在小城中心。可那時，家家戶戶都窮，一個班四十多個同學，基本上都沒有字典。可語文老師偏偏喜歡當衆表揚那一兩個有字典的同學，經常有意讓他們當衆查閱新課中的生字。那個時候，沒字典的同學感覺的是羞辱。無形壓力之下，我好多次走進新華書店，翻來覆去看那本只及課本一半開張的小字典，可臨了還是因爲沒錢買而悻悻離去。

在重慶能源短缺到連打開水也要排輪子的時期，還是少年的我被動員半途輟學到煤礦支援，臨行時我姐把她最心愛的字典送給了我。從那時起，那本不過巴掌大的字典一直陪伴着我。每天工餘，我總會把字典翻出來，像讀小說一樣一頁一頁讀下去，以致天長日久記熟了許多字所在的頁碼，字典本來很硬的外殼邊角也被磨破。那字典不僅知識上豐富了我，也在精神上滋養了我，讓我學會了在文化沙漠中獨享其樂。

「文革」期間，所有的字典辭典在書店遁形，想買字典辭典有如上天。一次隨年長的同事躲避武鬥逃難到省煤炭廳，見到滿地亂扔的書籍和紙屑中一部已沒了外殼的《辭源》，不禁心痛地想拾起來，卻又怕被人看到說讀「封資修」，於是磨磨蹭蹭等到天黑，待到衆人都去睡覺後才悄悄溜去，像做賊般拾起地上那本被踩踏得很髒的《辭源》。那已脫原形的《辭源》，從此與我朝夕相伴。在我的心目中，字典的價值勝似黃金。

一晃幾十年過去，而今再也不愁買不到買不起字典。隨着國家出版業越來越發達，我陸續買齊了過去朝思夜想的字典和辭典，包括《康熙字典》、《辭海》、《辭源》、《中華大字典》、《現代漢語辭典》、《成語辭典》。

可我發現，人是賤皮子，東西越是得不到越覺稀奇，越是富有時卻越是不在意。現在的我，早已沒了一有閒就靜下心讀字典的興趣與嗜好。十年前借用在重慶煤監局和重慶能源集團機關，幾年後受聘在重慶一家主流報紙做評論編輯，爲查字詞竟找不到一本字典。文人成堆之地尚且如此，遑論其他！

然而，字典作爲中國人離不了的工具書，其價值是沒法忽視的。從寧夏固原市原州區張易鎮上馬泉村的孩子們如飢似渴捧讀字典的照片，我確信自己的判斷：字典之於國人的價值，絕不遜於如今時髦青年手中的「蘋果」。我也相信，待到有一天人們重新鍾情於字典辭典之時，定然就是浮躁喧囂遠離我們之日。

問「獅」

文化什錦

司馬一孔

在我國，龍的圖騰，多處可見，龍的傳人，自當崇龍。亦有崇獅，獅的圖騰，不於龍下。到故宮一看，雄獅立於宮門內外，守護皇權，威懾臣民；到殘廟古剎一看，雄獅卧地，仰視信男善女，虔誠不二；到老城大宅門一看，仍有返古之感，「獅」告曰：「候稟入內」。可見獅子守門，比狗看家，更省食省心。

佛家有個說法，說雄獅一吼，音聲震世界。辭書上有一段註文：《傳燈錄》上說，釋迦佛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獅子吼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可見中國人愛獅崇獅，自當五體投地了。可是獅子的天國是在自然界裡，在熱帶、亞熱帶叢林草地裡，自由自在生活，不食人間煙火。因此人們不可能常見到獅子的雄姿，所以就把獅子誘困到動物園裡，供人觀賞；進而將獅子的形象製成木雕、玉雕、石雕、金雕、銀雕，擺在家裡，祥瑞朝夕，其形大者，還有臆念中的驅邪鎮宅之功能。

這還不夠崇獅之熱，很多大牌單位，很多「候大牌」單位，特別是新建、改建的門堂前，多設置雄獅一左一右。如逢典慶之日，雄獅與人同慶，披紅掛綠，見得獅面人心皆大悅也。此時，當問雄獅一句：今日興「獅」動衆，何以成風？「獅」自不答，而齜牙咧嘴之勢不改。

至此想到金代建造的四百八十五個姿態各殊的橋獅，曉月蘆溝；至此想到節慶吉日舞龍又舞獅，南方到北方百姓狂歡，傳承文化瑰寶，皆當歌頌。只是花大錢，亂置門獅，且成風火，恐石獅也不曾想到今日竟成高貴。如爲裝點門面，抬高檔次，可解一疑，那爲人民服務的機關單位門前設獅又爲何故？有損門庭之舉，雄獅也許怒而一吼；對於百姓來說，不畏官僚腐敗，難道怕得「相府」門前一對獅！

幼有所教

域外漫筆

馮　進

我所在美國小鎮的兒童百分之九十以上讀幼兒園（kindergarten）前都上過託兒所（preschool），以便日後更快適應學校生活。本地最大的託兒所所長K是個三四十歲的美國白人婦女，身材高挑，能幹利落。她介紹說，這個託兒所始建於一九六九年，一九九四年搬入現在的地方。目前他們有三十五個工作人員，一百四十個孩子、年齡從六周到小學四年級不等。他們每周開放五天，從早晨六時三十分到下午五時三十分，全年不休假，主要爲雙親工作的家庭服務。

託兒所的服務多種多樣，包括學齡前兒童（分爲兩歲以下的兒童、兩歲、三到五歲幾個班）的全託（五天一百五十三到一百八十八美元）和各種半託（可分幾個整天或半天），以及小學生延時班，暑假還有夏令營。如果一家幾個孩子同時入託，他們也提供相應的優惠價格。

接着，K帶我們去教室參觀。房間寬敞明亮，每間都附設廁所，還特地安裝了低矮的兒童抽水馬桶。牆上張貼着童趣盎然的彩色動物畫和英文字母的大小寫圖片，還有「過敏警示」。我有位同事的兒子對腰果和雞蛋過敏，牆上就貼着他的照片和引發過敏的食物單子。四歲孩子的教室裡，放着養小白鼠的籠子。夏令營學生的教室裡，有手語、西班牙語的貼圖。大一些的孩子，由老師陪着做手工，或用顏料在T恤衫上描描畫畫，或用手蘸上顏料在一大塊白布上打印。K告訴我們，今年美國國慶節，託兒所也要出動一輛大汽車參加遊行，孩子這是忙着裝飾呢。我注意到老師都席地而坐，光着腳，陪着孩子忙碌。嬰兒室則一派安詳，兩個保育員各抱一個六個月大小的孩子坐在搖椅上，另一位坐在地板上陪兩個八個月的孩子。

這個託兒所有兩個操場，兩歲以下孩子專用的以橡皮鋪地，更柔軟、安全。除了滑梯等常用器械，這裡還有激發孩子音樂、美術創意的工具。一大串金屬風鈴如編鐘般懸掛，幾面塑料鼓，一個塑料鍵盤，這些是鼓勵孩子們創造音樂的物件。邊上一塊塑料白板，下面是一串放彩筆的小洞，又可以啓迪孩子的繪畫靈感。天氣適宜時，孩子每天上、下午在室外活動各半小時；天氣不佳，則可在室內體育館遊戲。託兒所還有一個室內游泳池，水深不到一米，兩歲以上的孩子每周游泳一次，穿上救生衣，有救生員值班。孩子過生日，家長也會在這裡舉辦晚會，邀請他們的朋友一起來戲水取樂。平時老師也帶孩子出門，去鎮上的圖書館、大學的游泳館等。我們參觀時還經過一間不屬於這個託兒所的教室，K說這是聯邦政府爲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免費服務。

K提供的書面材料，包括給家長的有關須知，我翻了一下，覺得考慮得很細緻，例如，孩子在託兒所不玩「槍」或者其他暗示暴力的玩具等。我的總體印象是這個託兒所溫馨寧靜，設備優良，服務周全，強調孩子的創意、健康和安全，而不像中國幼教更側重學業。但收費不菲，難怪有的家長需要向小鎮基金會申請補助。

我們這次也順便參觀了託兒所旁邊的一個草根性社區基金會。他們的資產不到四百萬美元，但卻服務方圓三十英里、一個鄉八個小鎮的居民。本地有大規模的基建或其他項目，就會找他們幫助集資。個人想要捐獻，也可以找他們管理資產。他們還致力於提高兒童的識字率，贊助低收入家庭的幼兒教育等。這個基金會利用本地人的創意和幹勁，組織各種活動鼓勵大家熱愛家鄉，爲建設家鄉出力。因爲不依靠聯邦和州政府的資助，他們財力有限，但勝在土生土長，知根知底，既獨立又親密，是「我們自己的組織」。

「培養一個兒童需要整個社區」的理念在小鎮確實得到了最好的體現。

「文化差異」與「中國特色」

東西走廊

安立志

美國與中國之間，文化差異自然是存在的。二〇〇一年，一部名叫《刮痧》的電影，轟動中美兩國。在一個美國華人家庭裡，爺爺爲生病發燒的孫子「刮痧」，美國司法當局認爲是在虐待孩子，孩子的父親被法院起訴，引起一系列誤會。

時間剛過三個月，密歇根州則上演了《刮痧》的眞實版。當年五月，美籍華人曹顯慶因替患有尿道炎的八歲女兒塗藥、換衣服，被美國司法當局指控性侵女童。當其子女被強行帶走時，曹顯慶與警方發生衝突並被開槍打死，其妻子亦被控「忽視和未盡責任」，而被剝奪了對女兒的監護權。

兩則故事，一假一眞。家庭倫理、中醫醫術，作爲中國的文化符號，的確與美國以基督教爲背景的文化傳統存在着重大差異。不過，這種不同「物種」之間的差異不存在可比性，當然也就不存在是非優劣的價值判斷。其間所產生的誤會、衝突與悲劇，似乎大多緣於不同的文化認知。

以下這個事件就不同了。愛荷華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唐鵬因被指控強姦一名中國女留學生而被捕。被害人向美國警方舉報，從國內趕赴美國的唐鵬父母試圖通過賄賂方式讓她改變口供，從而導致了唐鵬父母的雙雙入獄。這一事件傳回國內，當網民們還在抨擊「中國富人把國內的壞習慣帶到美國去丟人」的時候，約翰遜縣檢察官卻以「文化差異」的理由放棄了對唐鵬父母的指控——這令期待中國法治進步的評論者無法接受，有人氣憤地指出，「文化差異」的意思，難道是「中國人就有賄賂證人的文化？」

《南方周末》在報道這一事件時，賦予了這樣一則標題——「花錢改口供：『文化差異』？　中國特色爹媽　難爲美國法律」。這則標題擬得極有學問、極有深意，通過這一事件將「文化差異」與「中國特色」聯繫起來。在美國，如果說對中國的家庭倫理、中醫醫術存在不同文化認知的話，那麼，法治思想、法律制度，除了法律體系、法律程序的歷史與技術區別之外，在理念上並不存在巨大差異，美國固然是以法立國，我國不是也曾提出「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麼？

近代以來，特別是「二戰」以來，在中國的對外交往史上，中美關係幾乎成爲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由於百年來的強弱格局，中美之間發生的任何帶有比較色彩的事物，中方總是以「中國國情」、「文化差異」以拒之。這其中確有「文化差異」的問題，但更多屬於軟性拒斥、軟性抵制的被動應對策略。這說明中國在與美國的比較中還存在着一系列的凹地，不僅在經濟、科技、軍事方面是如此，在政治、法律、文化方面也是如此。

文化差異原不足慮，「中國特色」作爲「文化差異」的遁詞，即使面對實力不濟的比較對象，也並不存在價值優越的涵義。「中國特色」、「朝鮮特色」、「印度特色」、「日本特色」，作爲文化差異，作爲文化存在，並不體現「中國特色」高於「別國特色」的價值判斷。外人以「文化差異」爲由對待中國，善意抑或惡意，畢竟那是外人的事情，而向來以「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相標榜的國人，如果經常將「文化差異」作爲抱殘守缺、蹈常襲故的藉口，常常說明這個民族在時代潮流、世界趨勢面前的不自覺與不自信。如同魯迅筆下那種認爲自己「即使還是浮腫，也是一種特別的好浮腫，與衆不同」（《且介亭雜文末編・附集・立此存照（三）》）一樣，終究體現着某種不長進。在這個意義上，如果僅僅強調「文化差異」似乎還有某種客觀判斷的話，那麼，「中國特色」總帶有爲落伍掩飾或辯解的「好浮腫」的性質。

「文化差異」與「中國特色」有無區別？有的，前者顯得更爲學術、更爲深刻、更爲空靈，後者則顯得更爲政治、更爲權術、更爲實際。在今天的地球村裡，「存異」固然無可厚非，「求同」畢竟是趨勢。古人的「大同世界」不消說了，即使以消滅「三大差別」爲目標的「共產主義」，也與片面強調「差異」與「特色」不相宜。曾經自稱「世界公民」的馬克思，這個以研究自然、社會和思維發展的一般規律爲己任的千年思想家，在其畢生的學術研究與革命事業中，從來不以強調「德國國情」、「德國特色」爲特徵，他從來不曾將歐洲各國的「文化差異」強調到不切實際的程度，他從來不曾把本國的發展道路自外於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進程和客觀規律，倒是反覆強調，「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這就是我對「文化差異」與「中國特色」的一點感悟。

德國海德堡　　李　波攝

胡蘭成改名換姓

人與事

王吳軍

由於在民國時期和女作家張愛玲有過一段感情糾葛，胡蘭成也就成了一位引人關注的名人。說起胡蘭成，人們最津津樂道的也正是他和張愛玲之間的恩恩怨怨，對於胡蘭成曾經改換姓名的事，知道的人恐怕就不是太多。

一九四〇年，汪精衛的僞政府成立，胡蘭成任汪僞政府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法制局長、《大楚報》主筆，成了一個可恥的漢奸。抗戰勝利後，做過漢奸的胡蘭成逃到浙江溫州隱居起來，並把姓名改爲張嘉儀，開始寫《山河歲月》這本書。其實，胡蘭成改換姓名的這一段時間是極其狼狽的逃亡歲月，但是，在他日後寫的回憶錄《今生今世》中，卻將之描繪得很是悠閒和美妙。

胡蘭成改換姓名爲張嘉儀後，認識了溫州當地的名宿劉景晨，接着，胡蘭成又結交了夏承燾、吳鷺山、徐朔方等學問淵博的文人。夏承燾在他的《天風閣學詞日記》中，有不少地方寫到了與張嘉儀的交往。把夏承燾的日記和胡蘭成的《今生今世》對比着來看，很能看出其中的一些情景。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夏承燾在日記中寫道：「張嘉儀來，留午飯。張君（張嘉儀）昨夕自溫來杭，謂五六日後往北京訪梁漱溟。」

胡蘭成在他的《今生今世》中，也提到了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和夏承燾的這次相見，但是，胡蘭成寫得比較籠統，也沒有具體的日期。

關於夏承燾在日記中寫的胡蘭成要「往北京訪梁漱溟」的事情，胡蘭成在他的《今生今世》中有詳細的記錄，胡蘭成說，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他仍在溫州中學教書，接到梁漱溟的來信，要他去北京。梁漱溟在見到新中國的開國領袖毛澤東主席後，把胡蘭成的信給毛澤東主席看了，胡蘭成說：「毛澤東不以我的信為然，但是答應了梁（漱溟）先生開辦文化比較研究機關，並問聘誰為副，梁（漱溟）先生推薦我，毛澤東亦同意了。我把《山河歲月》告一結束，又給了外婆一點錢，收拾行李動身。」這是胡蘭成說的這件事情的經過。

梁漱溟的回憶和年表中記錄的是，梁漱溟與毛澤東主席的談話是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二日晚上，梁漱溟向毛澤東主席建議設立文化研究所的事情，也是在這次談話中。但是，在夏承燾的日記中寫到，胡蘭成三月十三日就離開溫州到了杭州，所以，胡蘭成不可能是接到梁漱溟邀請他去文化研究所爲副手才動身的。梁漱溟建議設立的文化研究所後來因故也未能成立，如果這件事不是梁漱溟親自告訴胡蘭成，那麼，胡蘭成當時改換姓名躲在溫州，與外界基本是隔絕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胡蘭成是無從知道這件事的。所以，這件事只能推測是梁漱溟確實邀請胡蘭成去北京，但是，梁漱溟並不是邀請胡蘭成去協助他辦文化研究所。這些情況應該是梁漱溟後來寫信告訴胡蘭成的。至於梁漱溟把胡蘭成的信給毛澤東主席看，並且向毛澤東主席推薦胡蘭成去北京擔任文化研究所副所長，是存疑待考的。

改換姓名爲張嘉儀的胡蘭成從溫州到杭州，又到上海住了幾天，他隱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就放棄了去北京的打算，南下廣州，逃到了香港。胡蘭成在《今生今世》中說，這次「行前我寫信與梁漱溟先生，只說去香港接取家眷然後來北京。」可見，胡蘭成是跟梁漱溟說了謊話的。

胡蘭成用他改換的姓名張嘉儀，逃到香港後，又經香港逃亡到了日本，才恢復了他眞實的姓名——胡蘭成，他改換過的姓名「張嘉儀」從此就不再使用了。胡蘭成在日本期間，開始學習日語。後來，胡蘭成又結識了日本大數學家岡潔和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湯川秀樹，當然，這都是後話。

寂寞有價

人生在線

眞　如

內地作家麥家，近年來在影視圈掀起一波又一波熱浪，在現實生活中卻極之享受寂寞。麥家小說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一些生活在封閉世界的天才。麥家說在某些方面他自己就是這樣的人，孤獨地寫作、不擅社交、對任何集體的事沒有參與願望，所以他幾乎是成天呆在家中的人。他「常坐在書桌前發呆，窗外有花在扑簌扑簌地落下，就會聯想到過去一段感情經歷或者遠方的一個人。」

麥家筆下的英雄不是瘋了就是死了。他透露自己很認同博爾赫斯說過的一句話——「我犯下了人類最深重的罪孽，因爲我從來不感到幸福。」「一個人要幸福，一個美好的童年太重要了。幸福是一種習慣，有人生活貧窮但他照樣很幸福。我沒有這個榮幸。」麥家童年因爲父親的政治身份問題，忍受壓抑，造成作家內心深處隱密的苦痛。

作家痴迷寂寞不難理解，但像麥家這樣出奇享受寂寞，聲討物慾的，還眞不多見。看書買書逛書店是自稱「宅男」的麥家在生活中最享受的。「對現在的作家，我就是一個字：『守』。無名前，要守得住寂寞。成名後，要守得住名利的誘惑。」作家內心還是渴望寧靜，只有在寧靜下，才能寫，寫作需要孤獨。他說「人天生需要柔軟、溫暖、有力的東西，通過閱讀是最容易獲得這方面滿足的。」「我去國外，感興趣的不是高爾夫啊，草地啊，而是深深爲那種熱愛閱讀的氣氛所感動。」

麥家在央視《小崔說事》節目中的這番剖白，說得主持人崔永寧也不自在起來，情不自禁地對「追求一分鐘三次掌聲」的搞笑節目感到「厭倦」。

人眞該再次活在個體的、寧靜的生活中，從中獲取自己眞正想要的東西，並藉此體會麥家所說的：「慢是一種速度。」他正是在寂寞中悟到：「你有錢可以善待身體，但不能善待精神。精神的問題不能靠錢解決。」

范仲淹的烏鴉嘴

文史叢譚

李新剛

延安作爲革命聖地，我少時便已聞之。及讀了范仲淹的邊塞詞《漁家傲》知其曾戍邊延安後，則對延安又添了一份嚮往。今年初夏，特意坐火車去了一趟延安。路上，我吟誦着《漁家傲》，頓時，想起了范仲淹……

范仲淹如仕後的十餘年間，一直擔任地方上的小官，但他總是踏踏實實地幹一些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實事。他爲政清廉，體恤民情，剛直不阿，力主改革，屢遭誣謗，數度被貶。

好不容易逮了個機會進了朝廷，卻在公元一〇二九年的冬至前夕，聽說宋仁宗趙楨決定率文武百官於冬至日在會慶殿爲他的母親劉太后叩頭慶壽。范仲淹馬上上了一本奏章，認爲家禮與國禮不能混淆，這是有損君主尊嚴的事，應予制止。

這一事朝廷尚未答覆，范仲淹又奏了一本，說仁宗現已年滿二十歲，可以獨立擔當大任，劉太后應退居後宮，不需再垂簾聽政了。這使劉太后十分惱火，一紙詔書將范仲淹貶爲河中府通判。

這是范仲淹首次因言獲罪。

三年後太后病逝，仁宗即調范仲淹入朝任右司諫，工作就是評議朝事。此時又逢乾旱和蝗蟲災害蔓延山東半島和江淮流域，范即上書請予救助。未果，范仲淹則直問仁宗，如果把你宮中停糧，陛下該如何？仁宗汗顏，隨派范仲淹去賑災。

回朝不久，范仲淹發現當時的宰相呂夷簡廣開後門，濫用親友，便根據自己的調查，繪製了一張「百官圖」，在公元一〇三六年呈給宋仁宗。他指着圖中開列的衆官調陞情況，對呂夷簡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偏偏呂夷簡老謀深算，蠱惑君主將范仲淹貶爲饒州知州，後來幾乎又貶死在鎮南。

饒州在鄱陽湖畔。從開封走水路到此，至少須經十幾個州。除揚州外，一路之上竟無人出門接待，范仲淹對此毫不介意，反而作詩道：「世間榮辱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范仲淹自幼多病，當時又患了肺疾，到饒州不久，他的妻子也因病離去了。在附近做縣令的詩友梅堯臣，寄了一首《靈烏賦》給他：「靈烏靈烏，爾之為禽兮，何不高翔而遠翥？何為號呼於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將折爾翅而烹爾軀，徒悔焉而亡路。」

意思是說，你不要像啄木鳥一樣，啄了林中蟲，卻招來殺身之禍，面對貪官污吏不要過於耿直，你在朝中屢次直言，都被當作烏鴉不祥的叫聲，勸范仲淹應學報喜之鳥，而不要像烏鴉那樣報凶訊而「招唾罵於里閭」，要他管好自己的烏鴉嘴。

通過這篇《靈烏賦》，范仲淹已然看出梅堯臣和自己同歸而殊途，兩個人純粹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范仲淹立即回了一首《靈烏賦》：「……彼希聲之鳳凰，亦見譏於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見傷於魯人。鳳豈以譏而不靈，麟豈以傷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為神兵；焚而可變，孰為英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和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已經成爲中華民族無數仁人志士的座右銘……

到今天，范仲淹離開我們已九百多年了，但他那「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吶喊卻一直回響在我們耳際，促使我們思索。